

金色池塘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歌德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71期 | 2015年8月16日 星期日 主编:龚建星 责编:王瑜明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高文彬是我国唯一健在的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他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东吴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参与东京审判,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处翻译官,中国检察官秘书。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93岁的高文彬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赤诚的爱国情怀,在他的人生长河中从未被冲淡。

伸张正义 揪出杀人比赛狂魔

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提及南京大屠杀,高老脸色凝重地说:“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起初很多日本人是带着怀疑来参加法庭旁听的。因为当时的日本对国内言论严格控制,日本军队在外做的很多灭绝人性的坏事,报纸上并不宣传,只说他们怎么为祖国勇敢作战。在中国控方的大量资料和人证面前,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旁听的日本人都非常震惊,退庭时,他们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

高文彬除每天参加庭审,做好翻译和庭审记录签收及汇编工作,还在国际检察处的资料和档案中废寝忘食地搜寻日军侵华罪证。他看到一张1937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刊登着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途中,以砍掉中国人的头颅数量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最终向井以杀死106人“获胜”,而杀死105人的野田毅失败原因,仅仅是因为军刀“刀刃卷边”。照片上两个杀人狂并肩跨立,军刀拄地,恶魔般狞笑着,211名中国人惨死在他们屠刀下,且他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肆意杀戮还在继续着。

悲愤至极的高文彬,立即将报纸复制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通过中国首席检察官顾问倪征燠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其时,两人已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到国内。经过半年多艰苦搜寻,盟军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埼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杀人狂魔已然成为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两人于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同样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两个杀人狂和谷寿夫被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211个冤魂和30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九泉之下终可瞑目了。

矢志不渝 编审《英美法大词典》

新中国成立后,高文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正事业有成,却受“特嫌”老师牵连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江西劳改农场。那时没别的书可读,他将唯一可读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读了无数遍,不但厚实的英语功底始终保持,而且成为他相信终会澄清事实坚定活下去的动力,他的冤案最终得到平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逾花甲的高文彬勤奋地工作着:他参与翻译《国际法译丛》和《国际



文/图 张林凤

高文彬

东京审判亲历者的爱国情怀

永不褪色 镌刻心中的爱国情怀

高文彬是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教授,带教的研究生经常上门探望导师,他叮嘱他们,无论在哪里、哪个岗位上工作,一定记着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他时常嘱咐在国外的两个女儿和小辈们,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绝父女关系;他不辞辛苦地为青少年学生 and 社区居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激励人们不忘历史,热爱祖国。

高文彬还保持着海派男人作派,晚年的他安定幸福,在北海滩一幢高档商品房住宅里颐养天年。他衣冠整洁,爱喝咖啡、品红酒。除每天看电视新闻,还爱看军事题材和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剧,爱欣赏音乐、侍弄花草。每天早起做套健身操,以前还经常步行到外滩观景呢。

高文彬的家中,书橱里的书整齐地排列着;茶几上他正在阅读的报纸杂志总共有十多种;还有令人注目的一摞一摞整齐叠放的光碟,爱逛影像店的高老,每次都要购上几张喜爱的正版光碟;高老对摄影更情有独钟,早年社区组织居民活动,他会用自己红圈镜头的名牌单反相机热忱地为大家拍照,再亲自送到位于西藏中路福州路的那家专业图片社。居民看到照片上的自己赞不绝口:高教授让我们变年轻啦。爱“赶潮流”的高老,最大乐趣就是经常与女儿及小辈们发E-mail和视频对话,且是全英文往来。最令高老自豪的是,在美国的外孙女,小学和中学毕业时都荣获学生中的最高奖——美国总统奖,现在已是一家著名医院的医生,不但英语极好且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和上海话。女儿几乎每天与他通话,每一两年总要回家探望他。

“有历史”的老人

老老琐言

文/ 剑箫

有的老人家去世了,单位或有关部门往往会说一句“这是一个损失”或“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可以说,对于大多数的去世老人来说,这句话,只不过是例行的“外交辞令”,其意义仅在于对于逝者的尊重或敬意罢了。

有些老人,我们要把他当成宝,不是因为他官级有多大,也不因为他从前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而是他的存在,是对一段与整个人类有关的历史,起到一个见证人的作用。或曰,那些“有历史”的老人,不是写了许多的回忆录吗?不是说了无数遍的“口述历史”吗?他们的价值恐怕已经没什么的了。

这是不对的。

像高文彬先生那样的“东京审判亲历者”,他的存在是表示那段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还“活着”,还没有成为故纸堆,因此具有以一当十的能量!

前段时间,有学者对于“硕果仅存”的“慰安妇”的去世表示遗憾和担忧,这是因为她们的存在,是个“活教材”“活证人”,是个可以向曾经的战争罪人或战争制造国进行声索的“实体”,也是钉在现代军国主义分子身上一根很不舒服的“芒刺”。

我们要很好地保护高文彬们,他们是不同寻常的、“有历史”的“老人”,否则,我们的损失真的会很大。

私法译丛》;参加编写《涉外法律实用手册》;为英国伦敦劳伦士出版社《世界扣船》丛书撰写“中国扣船”部分。赴美国加州海斯汀大学法学院讲学,被该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二十世纪末,高文彬参与《英美法大词典》编审,这是一项精细、繁重却无报酬的工作,他毫不懈怠、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因请他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费劲,高老边勘误边对照,有出错的地方,用细细的笔写上工整的字修正,认真抄写后贴到样稿上。六本比砖头还厚的大词典,查阅对照

让高老耗力不少。为赶上约定的日子交稿,让《英美法大词典》早日问世,废寝忘食工作的高老累倒了。

躺在病床上的高文彬并不沮丧,乐观开朗的他,爱护鼓励年轻人,不但让实习医生为自己治病,还为他们辅导英语口语,用英语为他们讲述东京审判,年轻的医生们对这位满怀爱国热忱的老人肃然起敬。出院后,高老顾不上还虚弱的身体,又无怨无悔地投入到校编工作中,2003年,《英美法大词典》编审完稿,填补了我国重要英美法系工具书的空白。

采访手记

九旬摄影发烧友

在英国留学攻读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小罗姑娘,要写毕业论文,她选择写中国的抗日战争,我介绍她采访高文彬。高老幽默地对小罗说:“小张是我的老领导,老同学,她介绍的人,我是来者不拒啊。”我乘机自嘲:“我与高老是忘年交。”

我与高老交往近二十年,曾担任过他居住区的党支部书记,经常上门拜访他,所以高老调侃我是他的“老领导”,其实我是受益匪浅。所谓“老同学”倒有出处,那时高老摄影兴趣浓厚,每周双休日背着相机到银发大厦的老年大学学习摄影,我因工作需要,尽管不在学员年龄段,却“混”到一个名额,与高老成为摄影班同学。与他一起上课,切磋摄影技巧不亦乐乎。摄影班毕业时的集体合影是我俩曾经同学的见证呢。

这次采访高老,他见我拿出微单相机,一眼就看出是好品牌,饶有兴趣地欣赏,并为我和小罗拍照,过了一把快门瘾。看着孩子般高兴的他,我应允等到金秋十月,其女儿回国探亲时,我们一起陪同他,到摄影器材市场去兜风。